

中国例外论是否在损害中国外交政策的利益？

江忆恩 (Alastair Iain Johnston)

中国最根深蒂固的信念之一是，中国人民是一个独特的和平民族，他们从强调和谐的哲学和文化传统中汲取教益。就是因为这种信念的主张，所以历代中国统治者在应对外部威胁时，通常都会避免暴力和侵略，除非是别无他法。中国的评论人士在总结这种独特的和平取向时，常常会引用孔子的一句话，对中国人来说，“和为贵”；或者引用军事家孙子的著作《孙子兵法》中的名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最近十年左右，这种独特的和平文化基因，在官方报章《人民日报》上比以往受到更多关注。李克强总理说，“和为贵”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而习近平主席则道出中国人天生“爱好和平”。他甚至夸张地表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领导人和分析人士都使用这些有关中国人特性的说法来辩称，中国这个大国的崛起与以往其他大国并不相同。

这种自我描述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许多国家的人民都相信自己的例外论。事实上，他们经常批评那些他们认为无视国家例外论的人。美国例外论的信念——即把美国视为“山顶上闪闪生辉的城市”——便是对政治人物的试金石。一些批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右翼人士，就指责他不相信这种例外论。

无疑，中国人声称自己在文化上有独特的和平性，从实践经验来看是很有问题的。有大量的历史证据表明，在前现代和现代中国，中国领导人经常对其他王国和国家使用武力。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包括毛泽东时代，亦都有中国人大规模杀戮其他中国人的证据。

此外，社会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神经科学领域大量而有力的文献表明，人们对内群体独特性的看法往往与对外群体地位低下的看法有关，特别是当内群体感觉到其凝聚力受到威胁之时。在这种情况下，圈外人往往不仅被认为在标准上是低人一等，而且也是具有威胁性的竞争者。这助长人们对危险和恐惧的认知，继而导致他们在与外人打交道时强调寻求相应的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或共同收益。这样的世界观会使人们怀疑在自由贸易、军备控制或其他须表现出互惠互利的领域进行合作的好处。

因此，相信中国人民是具有独特的和平身份，其矛盾之处就在于这种信念实际上是与现实政治的世界观和政策偏好有关的。也就是说，中国人民愈相信自己是一个和平的民族，他们的外交政策就愈倾向于现实政治或强硬路线。

中国人一方面自认为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另一方面却更偏好现实政治的政策。上述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我的一项研究里得以证实，即是我在由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hina at Peking University) 进行的2015年"北京社会经济发展年度调查" (Beijing Area Study, 简称BAS) 中所做的分析。BAS采取随机抽样方法，访问大约2600名生活在北京的人。受访者需要回答一系列问题，以"和平"到"好战"七个等级对中国人进行评分，另外亦要对日本人和美国人进行同样的评分。其他问题则围绕某些外交政策的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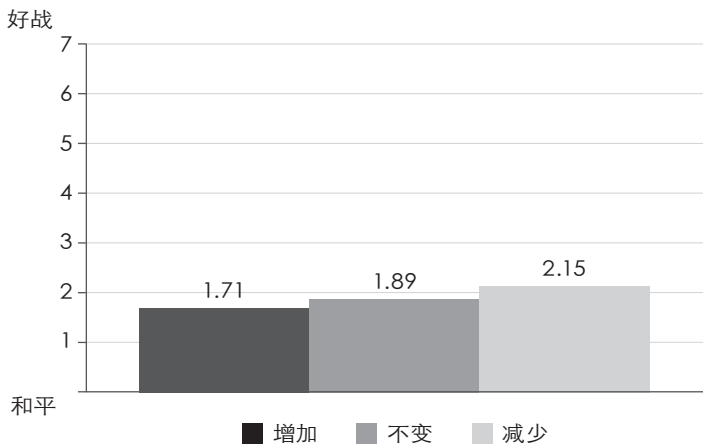
调查数据显示，认为中国人极其和平的受访者对日本和美国的友好程度，明显低于那些认为中国人不那么和平的人。而

且认为中国人民极其和平的人也表达出一种更强烈的感觉，认为美国正试图遏制中国的崛起。受访者愈认为中国人是和平的，在中国的国家安全方面，就愈关注传统的国家安全威胁（例如日本或美国的军事力量），而不太关注非传统的全球安全威胁（例如全球经济衰退和气候变化）。换言之，与中国人和平程度的观念相联系的，是一种狭隘、以中国为中心的威胁认知，而不是一种更全球化、共同的威胁认知。

因此不出所料的是，对中国人和平的认知与支持增加军费开支，存在一种紧密的线性关系。在图11.1中，y轴代表受访者对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的看法。横轴显示的则是受访者在此规模上对不同军费开支政策的支持度。受访者被问到他们是支持增加军费开支、保持军费不变，还是减少军费开支。图中显示了受访者对中国人和平程度的认知与对军费开支的支持度之间的线性关系。换言之，相较支持削减军费开支的人，支持增加军费开支的人更加相信中国人民是和平的。这种关系在统计学上是意味深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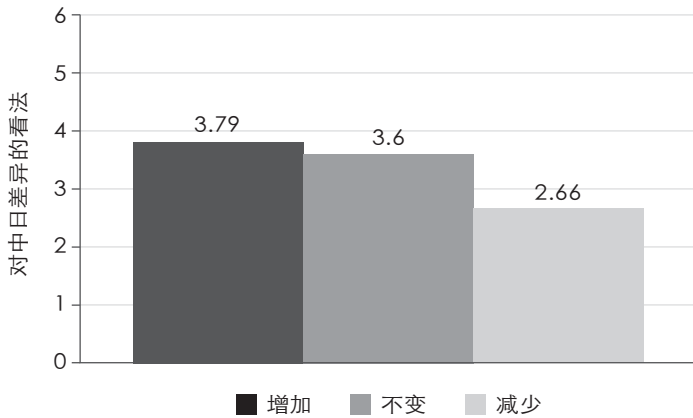
在调查受访者对中国人和日本人性格特征的比较时，这些

图11.1 受访者对中国人和平程度的看法与对军费开支的支持度之间的关系



来源：2015年“北京社会经济发展年度调查”

图11.2 对中国人和日本人差异的看法与关于军费开支的立场之间的关系



来源：2015年“北京社会经济发展年度调查”

结果往往就更为明显。也就是说，如果受访者认为中国人的和平程度与日本人的好战程度之间的差距愈大，其态度就会愈强硬。愈多受访者认为中国人和日本人不相同（中国人比日本人更爱好和平），他们对日本的友好程度就愈低。同样，愈多受访者认为中国人比日本人更和平，就愈容易认为日本是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而不是一系列其他基于国家或全球和非传统的安全威胁。认为中国人和平而日本人好战的观念愈强，受访者就愈倾向支持增加军费开支。在图11.2中，y轴的数值从0（认为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没有差异）增加到6（认为“和平的”中国人和“好战的”日本人之间存在最大的差异）。横轴显示对中日差异的看法与对军费开支的立场之间的线性关系。也就是说，那些支持增加军费开支的人，比那些希望削减军费开支的人，认为中日之间的差异要大得多。

我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天生就不比其他人爱好和平，即使中国人自己也会有相反的看法。我的这些数据分析表明，这些信念在中国社会的强度也存在明显差异。例如，那

些生长在城市、受过良好教育、曾到国外旅游的年轻人，对例外论信念的支持度，通常比那些没有这些特点的人要少。此外，关于中国人和平的信念，可能只是更复杂的例外论信念组合中的一种，比如也有人认为中国人民格外文明、真诚或谦虚。

这些都不足为奇。中国例外论的坚定信奉者就像美国例外论的忠诚信奉者一样：他们都倾向支持与自己的自我形象（在中国，他们自认为天生爱好和平；在美国，他们自认为天生善良、守法、公正）相悖的强硬政策。根据美国公共宗教研究所（Public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的一项研究，基于宗教的美国例外论信仰者比非信仰者更倾向于军国主义，也更倾向支持酷刑。我在一项研究中，分析了皮尤研究中心（Pew）于2012年有关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的调查数据，比较茶党（Tea Party）支持者和非支持者的态度。茶党的支持者一多是美国例外论的坚定信奉者——对外交政策的态度要强硬得多，包括在中国问题上。茶党的支持者更有可能将中国视为敌人，以及一系列政策领域的威胁。相较非支持者，包括其他共和党员，他们更支持对中国采取较为强硬的外交政策，包括使用武力保卫台湾。简而言之，中美两国对自身例外论的看法可能有着不同的外在表达方法，但它们似乎都对外交政策偏好有相似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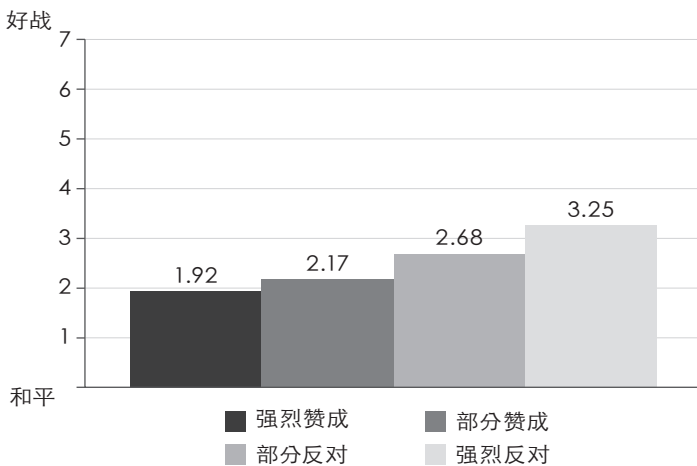
尽管中国领导人很可能真的相信中国有独特的和平理念，但也有可能是为了共产党的目的，刻意宣扬这一信念。这使得普通百姓和精英人士都相信，与其他国家的冲突是由那些国家引起的，而中国是没有过失的。

然而，这样做的效果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宣扬中国例外论有助巩固执政党在国内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它亦可能阻碍中国共产党致力通过发展更好的国际关系来加强其外部合法性。北京的“软实力”外交攻势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中国是一个独特且崇尚和平的国家。然而，这一论点实际上可能以两种方式破坏其外交努力。首先，强调中国独特的和平性质就是在暗

示其他国家是低劣的，使中国显得傲慢或虚伪。例如，由政府操控的一家媒体机构于2015年展开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发现，只有8%的发达国家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一个和平、合作和负责任的大国。相反，却有65%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中国正是这样的国家。如果中国领导人想改善中国天生和平的形象，那么他们的工作将非常艰巨。讽刺的是，强调中国人民所谓独特的和平特性很可能会适得其反。鉴于近年来中国军费开支大增和国内政治压制加剧，人们对中国崛起持相反看法，而这正是现实的情况。这些论述愈突出，关于中国固有的和平性质的说法，在别人眼里就显得愈虚伪和虚假。

这就涉及第二种影响：中国领导人对中国例外论的看法，也可能削弱他们理解其他国家看法的能力。坚信自己的独特特性，往往会引发人们对别人批评自己行为的合理性的强烈排斥。2013年“北京社会经济发展年度调查”的其中一条问题，就是问中国受访者是否同意这一说法：“当其他人批评中国时，那

图11.3 对中国人崇尚和平的看法与将对中国的批评个人化之间的关系



来源：2013年“北京社会经济发展年度调查”

就像是在批评我本人。”如图11.3所示，关于中国人有独特的和平性质的信念与将外国的批评个人化之间存在着一种线性关系（这种关系在统计学上是意义重大的）。如果这种关系也适用于中国领导人，那么他们对中国例外论的信念，很可能实际上会妨碍他们理解其他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

简而言之，信奉和宣传中国例外论会导致的结果——外国批评中国傲慢和虚伪，以及轻视外国的批评——很可能助长而不是减轻与其他国家的安全竞争。

但也有一些好消息：尽管关于身份认同的信念是非常顽固的，但也是可以改变的。实验室实验和调查都有证据表明，通过旅游、出国留学和消费外国文化产品，可以增加与其他社会和文化的接触；而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则可以帮助人们将非黑即白的身份观念转变为与互相理解有关联的灰色观念。在北京大学进行的一项心理学实验中，王东教授、博士生王宝玉（Wang Baoyu [音译]）和我发现，相较那些没有想到会有这种社交接触的人，当学生想象与某位日本人进行随意的社交接触，也能提高他们对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和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评价。此外，“北京社会经济发展年度调查”显示，1980年代或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对日本和日本人，以及美国和美国人的看法，通常比上几代人都更积极乐观。这也与事实相符：相较上几代人，在城市生长的中国年轻人对中国具有和平特性的极端观点更抱有怀疑。简而言之，愈国际化的中国青年就相对愈不可能相信中国例外论。

问题在于：如果中国领导人有意缓和与其他国家的安全竞争，他们就应该停止宣扬中国有独特的和平特性和中国例外的观念。相反，他们更应该强调中国人身份认同中的共同或普遍要素。但是，像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民族主义政治人物一样，他们似乎不太可能会自愿或者能够进行这样的自我反思。